

杨慎论民间传说

董晓萍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四川新都,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世宦大家。父亲杨廷和是明武宗、世宗两朝的名宰相。杨慎以贵胄出身,又盛负才名,自幼被李东阳目为小友,人称杨门“贾谊”。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出仕馆阁。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忤逆世宗,两遭廷杖,大难不死,被“永远充军”,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三十一年,客死戍所。

明初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通俗历史演义小说问世后,大江南北争诵,坊贾刊刻争售的“小说热”,同时引起许多封建知识分子对这一体裁性质归属的思考。当滥觞于出版界的讨论历史人物说、历史事物传说和小说事实背景关系的问题波澜初起的时候,杨慎正在巴蜀西南。他凭借投身荒徼的悠悠岁月,广泛结交少数民族群众,利用这里为诸葛亮传说发生地的优越条件,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写下了《新都八阵图记》、《云南山川志》、《滇程记》、《滇侯记》、《异鱼图赞》、《夏小正叙录》和《水经碑目引》等一系列撰述,提出了他对传说的历史性、文学性和人文地理性三特征的独到见解,从而以自己不失时机的劳作,成为民间传说早期理论建设领域内的新声开启者。

一、论传说的历史性

我国各封建王朝正史记载开发南中的事实,据统计主要有三件:一件是战国时秦国司马错定蜀,《史记》记这件事仅用了十一个字;二是楚庄跻王滇,《史记》用了八十六个字;三是诸葛亮平南中,《三国志》叙述此事只用了六十四个字。这从二十四史的数量来看是极不相称的;而如同流传在巴蜀云南地区有关诸葛亮的丰富传说比较就更不相称。西南不少地方的桥驿坪岭、篁水锁石以武侯命名;七擒孟获、赐姓南中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故事。傣族、佤族、基诺族人民中间传开着诸葛亮如何教他们仿照自己帽子的形状盖竹楼,教他们种茶叶和开放“孔明灯”;滇西的哀牢、昆明、嵩人、掸人和各种濮人把楚庄跻王滇、甚至连前述史载之外的蜀太守李冰和常璩修“五尺道”、疏通滇蜀关塞的事迹,也统统附会在诸葛亮身上;又说他们会立春鞭牛、精耕细作皆学自诸葛亮。人民对这位优秀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赞美。形于色、见于物,使杨慎滇程南下,一路叩拜,无限感叹。为什么封建王朝三度开发南中,唯独诸葛亮这次被民间传说得这样出神入化、沉实久远呢?我们选其中早八阵的传

说为例，来看杨慎发表的他关于传说能通过民众眼中的历史事实反映社会本质的看法：

“千载之下，君子独遗恨于蜀汉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垒遗墟，独为之爱惜不已，乃其忠愤之激人，不独其法制阵伍之妙也。不然，则窦宪突勒八阵以击匈奴，晋马隆用八阵以复凉州，是在侯之前已有之，而后亦无尝亡也。功既有成而后世犹罕所称述，况能传其遗迹至今乎？……此乃其精诚之贯，天之所支而不可坏者，盖非独人爱惜之而已耳①。”

其实，连八阵图也并非诸葛亮的发明，其远“肇于黄帝、具于成周”不说，杨慎指出就是诸葛亮之前，也有汉窦宪、晋马隆的成功运用。而民间对这些“罕所称述”，只把诸葛亮的八阵图说神了，奥妙“乃其忠义之激人”、“精诚之贯，天之所支而不可坏”，即原因不在正史定评和地方风物本身，而在于诸葛亮的政治品格与“和抚”政策，适应了当时西南社会的发展现实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历史要求，因而使这一诸葛亮的传说便具了一定的历史性。

杨慎的结论是不错的。春秋战国以后，在建立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斗争中，虽有庄跻王滇，以及秦汉以后的多次朝廷在滇池地区募民“造地灌溉”，发展了西南边疆的经济生产，但“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②”。封建王朝靠“以兵临滇”、“无岁不征”，把少数民族群众置于“苦其役调”的附属地位，在开发南中的同时又恶化了汉夷关系，以至东汉中期以后，“大姓”、“夷帅”等奴隶主们控制了云南，中断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关系。

蜀汉时代的诸葛亮注意吸取历史教训。他根据当时云南社会发展的水平，除对极个别的奴隶主势力进行平叛外，对多数地方夷长则尊重其信仰风俗，慎重稳进地维护他们的利益，改善了封建王朝长期镇压南中造成的紧张局面。他还根据洱海地区游牧部落“毋常处”、“毋君长”的落后经济状况，“劝农业、薄赋收”，鼓励当地人民“富国安家”，又把“夷帅”统治下的“羸弱”奴隶和依附民分配给大姓做“部曲”，比过去纯属“僮仆”的奴隶地位解放得多。同时，在云南其它山野平原大力开展屯田，发展生产，结果，不仅使原始的游牧部落定居下来，成为“上方夷（山区居民）”和“下方夷（坝区居民）”，而且，在已达到封建经济水平的地区又出现了新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诸葛亮因此成为川滇上下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所“举踵思慕”的著名历史人物。关于他的口传历史也就越来越多，关于其遗迹的风物也就越发得到爱惜，远非《三国志》的六十四字可比，而却事实上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素材基础。这就是杨慎所谓“天之所支而不可坏”。他的意思是说，一种民间传说流传的久暂是不能用封建正史的记录多寡来衡量的，它依托于历史，又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各族人民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和心理素质水平才是传说的历史基础。

杨慎这一观点是符合历史传说的产生与演变的自身规律的。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要为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所认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内聚性与向心性的形成过程。因此，这种传说的内容一旦固定下来，就会得到人民的自觉维护，成为人民精神生活的历史伴随物，任何外来因素想要改变它都是极其困难的。

二、论传说的文学性

传说作为口头历史文学，主要表现人民朴素的史评史论，体现在传说作品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主观意图，或说人民群众对人物与实事的能动的联想与理解活动。这就使传说在反

映历史时，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等艺术加工，即使用同一传说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异文，这就是传说的文学性。我们暂时离开三国英雄，试看杨慎引用两个传说来进行的对照说明：

“太湖西有砬岭山，有石如卷笮。相传云：‘禹所用牵山笮也’。会稽又有驱山驿，二事与秦王鞭石成桥相类。好怪者傅会之说邪？抑古原有此术也③。”

述说天神可以用带有魔法性质的工具，如一根竹索、一只铜铃等移山填湖，消除大地上的水陆山川障碍。这类神话反映了在远古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人类祖先要在自然界中化被动为主动，保障生活，发展生产的渴望。但自它被文明时代的文人追记时起，就已结束了它赖以创作的原始思维和得以发展的原始社会历史，没有给后人留下去看、去摸、去再创造的余地。杨慎指出，传说与此大不相同。传说是可以“傅会”的，附会就是文学化的再创造。例如，把神仙移山的幻术附会到太湖和会稽实有其久的山石峰岭之上，然后让当地群众面对自己家乡的自然风物，又去生发联想，创作出他们喜闻乐道的“牵山”和“驱山”新故事。为什么能够再创造？再创造又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杨慎以为传说再创造的契机是“如”，比方“有石如卷笮。”地方风物千姿百态的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大有余地的形象思维体系，令人触景生情。广大劳动群众积年累月生活在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中，对自己家乡的风物了如指掌，自然会从中提炼出传奇的情节来。而关键尤在传说所附会的历史，杨慎举出的两个在群众口头创作中影响深远的典型历史人物形象——大禹和秦始皇，都已不再是官修正史中的天帝人皇，而是劳动群众自己队伍中手持生产工具的英雄；他们的“牵山”、“驱山”、“鞭成石桥”的史事更不见于经传。人们只把他们的历史活动中代表人民意愿，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一面，作为口头历史创作加工传播开去。

由此可见，传说的内容在文学化的过程中带有极大情感色彩和审美倾向性。劳动群众只认同那些自己认为是美的形象和美的事物的历史，这点与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史学观念无关，却又与通俗小说作者的感情倾向关系密切了。

三、论传说的人文地理性

传说的人文地理特征，是指传说不仅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而且也产生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中。诸葛亮传说诞生的川滇西南地区，自然风光秀丽；史称“荒凉毒疠之区”的具云南，更别一番幽美：这里本其地有苍山洱海，有风花雪月四时皆宜的景色和长于艺术创造的多民族传说，它们无时不在提醒着通俗小说的作者美化自己笔下的巴蜀环境描写，也召唤着热爱民族历史，崇敬诸葛亮品格智慧的杨慎，不因自己的滴戍流离，而稍减收集这里风物传说的壮志，阐述他对这类传说描绘人文环境的看法。

“滇海西斥，舍舟登陆，俗曰高桥。稽之古志，桥实曰峽，以山形似秦峽关，受此称尔。……谷梁子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范宁曰：‘物类地形’。慎自执戟于滇，每慨物类与地形名失之陋俗。昔崧嶮而为禄祿，吕閤而为吕言，金浪巖之为丁当丁，澜沧江之为浪沧江也，不止峽之为桥耳。④”

我们看到，杨慎在研究这些传说时发现，对同一环境中的自然物或人工物来历的解释，常常有史志记载与民间口传的差异。历代史官掌天文星历水文地理兼管国家图书，由于他们

的努力，使我们丰富的山川风物传说在正史的《地理志》、《五行志》及大量的方志中得到书面反映。曾“执简史局”的杨慎，熟悉这些官修史志上的传说资料，“叹”其在民间发生“讹”、“谬”，是不足深怪的。可贵的是，他毕竟从“失之陋俗”的慨叹中，发现了以往史家“不行万里路……惟不可及、亦不能知”^⑤的局限，认识到“不止峽之为桥”，“方言既讹，郡志踵谬”是一种普遍事实，在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则是“物类地形”、“名从主人”的风物传说形成规律。人民群众是活动在特定人文地理环境中的主人，某一风物传说一旦被他们创造出来，便在环境因素上表现为一种停滞性，即不管今后传说的内容怎样变幻，一经失去地方地理特色，便会遭到他们的巧妙排斥。杨慎举了一个滇西永平境内“叫狗山的传说”的例子：

山一名“观音叫狗山”，《白古记》（即《白古通记》——作者注）及《佛祖记》皆载其事，云：“昔洱河之地，有罗刹一部出焉”……盖此地耶。西天佛书称妙香城，毘罗国土也。^⑥

唐贞观以后，密教僧徒为弘扬佛法，常常把印度的灵山圣水移到云南的本土上。如这一传说，便是把“叫狗山”改装成《观音七化》中的印度环境。然而，民间“叫狗山的传说”却未因密教的兴盛而泯灭，它把密教徒炮制的传说溶化、复原，到杨慎明代来此山下时，已恢复了体现当地山川形势特点的“娘娘叫狗山，九转十八弯”的传说原貌。

当然，长期以来，云南密教作为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而颇使一些“灵迹亦殊于他方”，也是事实。但杨慎以密教改作的“金马碧鸡”、“望夫云”等传说终未在民间传开，而《大明一统志》终究以生命力强大的土著传说为准，来叙述云南山川风物的结局告诉人们，地理环境被外化的越纯粹，离开当地人们的认同心理也就越遥远^⑦。也许，他们有时也会暂时接受某种外来传说，但其前提和归宿都是地点不变，一定要是家乡的山川风土。

那么，人文地理因素应包括哪些内容？杨慎通过他的《点苍山游记》告诉我们，第一，它应该是由各种山石塔碑等纪念物传说组成的集合体。失去了这些自由排列的小环境传说，整个传说的大环境就失去了最大限度的被审美欣赏的条件。第二，包括地方特产。他为此专门写过《滇候记》，编纂过《异鱼图赞》，收有讲述过去云南特产弓鱼、鱣鱼、滇池鲫鱼等六条传说。第三，包括节日风俗。如：“俗有火炬之节，丑末月之廿四日，是其辰也。是节系鲜祭，小儿各持火喧戏于市，若中州之上元然”^⑧。这些风俗节日调整人们的生活节奏，提供给人们社交环境；离开了它，人们对地方风物传说的接受兴致也会相对黯淡。第四，杨慎记录在《滇候记》、《夏小正叙录》中的传说还说明，应该包括气候，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共雷”。云南因与内地气候的南北差异、高下差异和物候的古今差异，也会使各族人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安排生活和生产，因而使其传说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色，如：“入滇境，多海风，飞大屋，八骑辟易。贵之雨，云之风，天地之偏气也。”外来的传说违反了这一环境要素，便同样要遇到排斥。第五，环境因素又经常穿插着虚构的人物活动。“有大禹采药亭，在大业山。其地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载，闻之士人云。”^⑨“往往不可到”便是情节的传奇性，它可以使地方风物传说借用古圣昔贤而增色，让人们从中寄托希望。直到把自己家乡的环境塑造成理想的尺寸。杨慎站在热爱民俗文艺的立场，把历史传说当作区别于封建正史，却为通俗史传的文学的必要素材，来探讨其发生、发展与变异的规律，这对传说学的研究是一个方法上的贡献。

（一）它揭示出从历史到民间传说中间横着一个形象体系——与历史人物或事件有关的

自然物或人工物。这个形象体系是传说表达内容的外壳，它包含的义域是宽泛而模糊的，传说的创作者要调动自己的经验贮存和想象功能去进行理解和补充。因此，在这一层次里，形象体系实际上已成了广大民众倾述喜怒哀乐、寄托理想愿望的契机和媒触。一般说来，这个形象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离开人们的现实生活越遥远，它给传说创作者所提供的审美再创作空间就越大。

(二)所以，传说是社会历史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终点，也是通俗小说作者的创作意识开始有规律活动的起点。从宏观角度看，这种活动实践的结果，又积淀为民众审美心理定势，从而使其传说的史评史论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与历史双重价值。

(三)但是，运用改编、传说不能离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否则，便不可能分析传说发展中的史评史论属于哪种性质的文化；强调通俗文艺的史评娱乐功能，也就成了脱离民俗文艺学史发展实际的研究。

注释：

- ①〔明〕杨慎《新都八阵图记》，又名《弥牟八阵图记》。见清道光新都刻本《升庵全集》。
-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
- ③〔明〕杨慎《丹铅续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36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 ④〔明〕杨慎《碧峤精舍记》。参见〔明〕谢肇淛《滇略》，明刻本。
- ⑤〔明〕杨慎《南中续集·序》，明嘉靖刻本。
- ⑥〔明〕杨慎《滇程记》，《杨升庵杂著》，明万历本。
- ⑦〔明〕杨慎《云南山川志》，《函海》钟登甲重刊本。杨慎此著据《大明一统志》摘编而成，择别即有新意，不完全是叙述原文；再参见杨慎《丹铅别录自序》，清道光新都刻本《全集》。
- ⑧〔明〕杨慎《丹铅续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36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 ⑨〔明〕杨慎《点苍山游记》，见《大理府志》，清康熙刻本。

(上接第52页)

系密切，但又各自分道扬镳，张旗树帜。弹词、戏曲是以词曲宫调演唱为主，道白为辅，散文在剧中只起串连故事的作用。而小说是以散文描写为主，诗歌谣谚等韵文为辅的，而诗赋等韵文在小说中，又起艺术升华画龙点睛的作用。小说使用歌谣等韵文，是调动弹词、戏曲等文学功能来为小说服务，可说是集中各种文体之长，汇粹各种文艺特点于一身。南宋文学家赵孟坚说：“诗者，英气之发现于人也。”认为人之有诗，“亦犹天英气，景星庆云；地有英气，朱草紫芝”（《彝斋文编·孙雪窗诗集序》）。这里也可以这样说，小说之有歌赋等韵文，亦犹绿树之开红花，长藤之结硕果，项琤之串明珠，不但使小说文彩斐然，而且也使人一新耳目。它使人读后熔铸情操，陶冶性灵，功绩非浅。这是中国古典小说才有的特色。因之研究《三国演义》歌赋谣谚等韵文的运用，对掌握本书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成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无疑都有裨益。